

# 试析《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效果

## ——从跨文化文学传播“反馈”的视角

金 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三国演义》; 泰国; 文学传播; 跨文化; 反馈

[摘 要] 反馈对于跨文化文学传播非常重要。一个良好的反馈可以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够被异文化语境中的读者真正接受, 是使传播达到最佳效果的关键一环。《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文学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通过“把关人”、“意见领袖”带动的积极反馈, 以及由此激发的“创新扩散”, 《三国演义》在泰国获得了高度的认可和接受, 并成功地内化到泰国本土文化之中。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3)02-0107-05

### On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in Thailand —The Role of Feedback in Cross-Cultural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Jin Yong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words:**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ailand;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e; Feedback

**Abstract:** Feedback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ross-cultural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An effective feedback can decide whether a literary work could be totally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in foreign cultural context, which is the vital link to achieve the best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 communica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ailand is such a classical case of cross-cultural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active feedback of “Gatekeeper” and “Opinion Leader”, as well as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which was inspired by them,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highly appraised and adopted by Thai people, and it was domesticated by Thai local culture and turned into a Thai local literature masterwork.

文学问题与传播不可分离。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法兰克福学派的利奥·洛文塔尔 (Leo Löwenthal) 便开创了文学的传播研究, 并视传播为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sup>[1]</sup>。文学传播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动态过程, 在具体传播过程中, 最终的传播效果会受到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社会力量、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这一点在异文化语境下的跨文化文学传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中泰文化和文学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节, 也是跨文化文学传播的经典个案。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效果问题, 并具体分析“反馈”对实现跨文化文学传播效果的作用。

### 一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效果概述

1802 年, 曼谷王朝一世王为了重振因泰缅战争战火涂炭而衰落的泰国古典文学, 御令当时的著名诗人昭帕耶帕康 (洪) [Chaophraya Phrakhleng (Hon)] 主持翻译《三国演义》, 并将其作为中兴泰国“国家文学” (National Literature) 的重要举措, 由此出现了《三国演义》的第一部泰文译本

[收稿日期] 2012-03-20

[作者简介] 金勇, 博士,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模式研究” (11CWW006)。

《三国》(Samkok)<sup>①</sup>。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间,《三国》在泰国逐渐流传开来,受到泰国人的喜爱和推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曼谷王朝六世王瓦栖拉兀时期,洪版《三国》被当时官方权威的“泰国文学俱乐部”评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部分章节如“草船借箭”和“火烧战船”等片段后来还被选入泰国中学的泰语教材。洪版《三国》对泰国文学影响巨大,它不仅结束了一直以来泰国韵文体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推动了泰国古小说文类的生成,进而促进了“小说文类”在泰国文坛的生成和发展,为近代泰国接受西方新小说奠定了良好基础。继洪版《三国》之后,泰国后来还推出许多《三国》的“重写”版本,包括各类译本、改写本、仿写本和再创作本等。此外,《三国》还参与到泰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形成了独具泰国特色的“三国政治文化”,在泰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泰国有句俗语,叫“《三国》读三遍,此人不可交”,意思是说《三国》里面充满了政治斗争与谋略智慧,读得太多会让人变得城府狡诈,这样的人不可与之交友。由此可以管窥泰国人对《三国演义》的熟稔与喜爱程度<sup>②</sup>。

总之,泰国人已经把洪版《三国》视为本民族的文学财富,对里面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对其中的箴言警句和俗谚俚语都耳熟能详。《三国》已经深植于泰国人日常的生活之中,成为泰国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毫不为过。可以说,《三国演义》在泰国大获成功,传播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从文学发生学的立场上说,在泰国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下,《三国演义》能够获得泰国社会的广泛认可殊为不易,因为泰国不同于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汉文化圈的国家地区,历史上它是一个传统的“印度化”国家,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受到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语言障碍是《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重要藩篱,泰国官方从未使用过作为文学传播载体的汉字,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使得泰国人接受《三国演义》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种条件下,《三国演义》不但受到欢迎,还被提升到“国家文学”的高度,泰国甚至动用官方力量组织翻译工作,如此礼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在上述汉文

化圈的国家中也很少见到,可以说达到了极佳的传播效果。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三国演义》本身具有的极高的文学价值、昭帕耶帕康(洪)精湛的译文文笔、泰国王室的青睐与支持以及华人社会的影响在泰国不断壮大等。但这些都是外在原因,更重要的是要让泰国受众在心理上对《三国演义》产生文化认同感,自动自觉地将其内化并应用到本土生活经验中去。这种效果的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传播过程中的“反馈”一环反复积累才最终得以实现的。

## 二 跨文化文学传播中的“反馈”环节

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是需要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界限的对外传播,属于广义的国际传播现象<sup>③</sup>。对于跨文化文学传播而言,作为信源的传播者是作品的作者(译者),作为信宿的接受者是本土读者,传播的信息或内容就是文学的文本,传播过程分为对信息的编码(广义的创作)和解码(广义的阅读)过程。与一般的文学传播相比,跨文化文学传播面临着复杂多样的文化差异问题,传播过程中存在误读或“不正确理解”等阻碍传播顺利进行或影响信息正确传递的“噪音”,因此一部文学作品要在异文化语境中扎下根来,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难度可想而知。

对跨文化的文学传播来说,最深刻的效果莫过于对异文化国度的文学和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内涵不同于模仿、同源、流行、借用等,而是“一个有生命的移植过程,通过本文化的过滤、变形而表现在作品之中”<sup>[2]</sup>,是一种在异文化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一部作品的文学信息通过传播媒介达到受众,并不意味着已经产生了效果。只有当读者体味到作者的情感与审美,心灵受到感染和触动,从而使他们的某种态度或观念发生转变时,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社会效果,一次成功的跨文化文学传播进程才真正结束。在传播效果达成的过程中,“反馈”环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馈”(Feedback)原本是电子工程学的名词,指电磁波或者所携带信息的回流,但应用在传播研究中,则是指受传者对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的反

<sup>①</sup> 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提到《三国演义》指罗贯中的作品,而《三国》仅指曼谷王朝一世王时的泰译本,即昭帕耶帕康(洪)版《三国》,简称洪版《三国》,其余版本都会加以说明。

<sup>②</sup> 有关《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与译介的详细信息,参见金勇《泰文〈三国演义〉经典译本产生的原因分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金勇《〈三国演义〉在泰国的文学本土进程》,《亚太研究论丛(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sup>③</sup> 关于国际传播,学界有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的国际传播,特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即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见程曼丽、王维佳《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应。19世纪50年代,在传播模式研究中引入“反馈”的思路,突出代表是“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该模式表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存在着反馈,并且这种反馈的成果会被传播双方所共享。它打破了传统上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和“申农—韦弗模式”为代表的对传播过程的单向理解,转而形成多向的循环观念。一个好的反馈机制可以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够被异文化语境中的读者真正认可和接受,是使传播达到最佳效果的关键一环。

“反馈”对《三国演义》在泰国的跨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下三个关键因素使反馈机制得以顺利运作,不但推动了传播的顺利进行,还保证传播达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三个因素分别是“把关人”、“意见领袖”和“创新扩散”。

### 三 “把关人”的反馈

首先,文学作品需经过“把关人”的反馈,才能进入到异文化的语境中,这种把关或反馈即“文化过滤”。“把关人”(Gatekeeper)是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最早提出并被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引入新闻研究领域之中的。在跨文化文学传播中,受者与传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鉴赏、选择的动机与目的也都好尚不同,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因此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把关人,他们首先对这部作品进行一定的反馈,只有符合一定本土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文学传播中译文与原文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对于《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而言,最重要的一位把关人是主持翻译工作的昭帕耶帕康(洪),他领导的翻译组由两部分构成,先是由华人们将中文的《三国演义》文本口译成质朴的泰语,再由宫廷诗人们进行润饰,最终由昭帕耶帕康(洪)定稿。文化差异是造成翻译困难的障碍之一,特别是一些中国文化意涵极强的事物,若原原本本地直译过来,要么泰国读者无法理解,要么因与泰国文化传统相左而难以被接受。出于各种考量,昭帕耶帕康(洪)将中国文化“和谐、巧妙地融入到泰国人的语境之中”<sup>[3]</sup>,将泰国本土文化的元素注入到译文中,让译文更符合泰国人的欣赏习惯。除了一些因理解和华人与泰方译者沟通配合上的失误所造成的误译和错译外,一些不便翻译的内容被悉数删去。此外,还有一些内容是译者为了配合国王的政治意图进行了有意的删改,整个翻译

过程可以说是一次积极主动的反馈。因此,泰文《三国》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而是一部以《三国演义》为蓝本进行的再创作,泰国著名的《三国》研究专家玛丽尼·蒂洛瓦尼一针见血地指出,洪版译文仅从情节内容和专有名词上保留了中国特色,但其本质却是泰国的(Thai Intrinsicly),她甚至认为有60%左右的内容是为了泰国读者而改写的<sup>[4]</sup>。所以,泰国人才将洪版《三国》作为泰国本土文学来看待,泰国学界也多从泰国文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是《三国演义》在泰国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有积极的反馈,也有消极的反馈。除了洪版经典译本,《三国演义》在泰国还有两个全译本,分别是万崴·帕塔诺泰的《新译〈三国〉》(1977年)和威瓦·巴查冷威的《批注本全版〈三国〉》(2001年),二者不约而同地突出和强调自己译本的“完整性”,完全“忠实”于原著,因而更加权威。这显然是针对洪版《三国》的“不忠实”而提出的,但是他们看重的“原汁原味”却并不为泰国读者认可,洪版《三国》中的“不正确理解”早已被内化成为泰国文化中的一部分,被泰国人广泛接受。因此,这两个“忠实”版本在泰国反响平平,除了那些要进行《三国》研究但却苦于不懂中文的学者们之外少有人问津。

### 四 “意见领袖”的反馈

其次,反馈的过程有不同层次,并需要主导传播的“意见领袖”。跨文化传播周期较长,文学信息抵达不同层次的受众也有先有后,文学传播特别依赖高水平的译者和高质量的翻译,这里的高水平、高质量是针对受者的本土化文化语境而言的。这些译者是文学信息接触到的最早一批异文化受者,同时也是文学信息向更广大异文化受众传播的重要中转,在传播学意义上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是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的“二级传播理论”(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中提出的概念,认为传播过程因受多种中介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效果有限,媒介讯息和观念不是直接传向所有个人,而是先流向意见领袖,然后经由意见领袖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其他部分。在跨文化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是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往往是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化名人或知名学者,他们能够较早地接触或敏锐地洞察到文学信息并且对其进行翻译、创作、批评等文艺活动,同时他们本人在社会上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在文学

场域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的作品或评论能被读者较大规模地接受和传播。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意见领袖同时也身兼把关人的职能。

在《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意见领袖有昭帕耶帕康（洪）、雅各布、克立·巴莫、桑·帕塔诺泰等人。其中，昭帕耶帕康（洪）是《三国演义》第一部也是最经典的泰文译本的主译者，他是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掌管国家财务的“四大臣”之一，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著名诗人，深得一世王的器重和信任。抛开“不忠实”的指摘，洪版《三国》文笔优美，语言风格简洁明快、通俗流畅，令人耳目一新，被人称作“三国体”（Samnuan Samkok），自问世以来迅速风靡泰国社会各个阶层。1805年译本诞生后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宫廷和贵族间广泛传阅，1865年印刷出版以后其影响很快就扩展到全泰国范围，从宫廷到民间都反响热烈。“三国体”因其经典的语言风格而为人推崇，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们翻译和创作的范本语言，并带动了散文体文学的兴起，最终结束了韵文体文学在泰国文坛一统天下的局面。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影响并不是仅仅通过洪版《三国》实现的，而是由一代代泰国作家持续不断的“反馈”共同完成的。洪版《三国》之后，许多作家出于不同目的，从各自角度出发，对《三国演义》进行阐释、改写、评论、重译，在这些“重写”版本中以雅各布的《卖艺乞丐版〈三国〉》、克立·巴莫的《富豪版〈三国〉》和桑·帕塔诺泰的《〈三国〉军事战略》最为重要，影响最大。雅各布是笔名，他本名叫丘·沛潘，是泰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报刊专栏作家，他是泰国第一部《三国》改写版本的作者，并开创了这一风潮。尽管洪版《三国》相比于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已经算很通俗了，但它的语言文白相杂，对于当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泰国人来说仍然难度颇大，且洪版《三国》鸿篇巨制，登场人物不可胜数，情节复杂，普通读者很难把握。雅各布选取了18个重要的三国人物，以人物传记的形式重写《三国》。他模仿华人说书艺人的口气和讲述方式，语言以简洁平实的口语体为主，通俗流畅，甚至还掺杂了一些当时流行的爱情小说的语言。这些都大大降低了阅读《三国》的门槛，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一系列有单行本，也有合集，都反复再版印制，其中“孔明”分册单行本，自1943年首版至今已经至少再版20多次。受雅各布启发，另一位泰国文豪克立·巴莫亲王也推出了《富豪版〈三国〉》，以一位在盛宴上为来宾讲故事的大亨的口

吻讲述三国故事。克立·巴莫本身是王族出身，除了在文坛的地位颇高，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曾出任泰国总理，并在任期内与中国正式建交。克立·巴莫的小说素以语言辛辣、文笔幽默、构思新颖奇特著称，《富豪版〈三国〉》共有两部，都一反常规，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第一部以孟获这位常被人忽视的次要人物为主人公，并把他臆想成一个泰人，英勇地对抗蜀汉这个来自中原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第二部以曹操为主人公，一反惯常的“拥刘抑曹”的观点，站在曹操的立场，认为曹操是卫国忠臣，而刘备才是奸诈之徒。两部著作都成书于泰国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书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对泰国普通人的影响极深，至今仍有人笃信孟获是泰族人这一不实的说法，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与雅各布和克立·巴莫不同，桑·帕塔诺泰的重写版本并不是以小说的形式，而是以阐释和评论的方式呈现的。桑曾是奎披汶内阁的高级幕僚，也曾是泰国人家喻户晓的广播节目主持人，1958年沙立·他纳叻发动武装政变后，桑被投入监狱直至1965年才被释放。他在被囚期间写出了《〈三国〉军事战略》，将个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抱负寄托于三国的人物和故事中，使之成为其政治表达的工具。桑版《三国》使人们意识到《三国》文本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和可塑性，读者们读完《三国》后也纷纷开始私人化的个性解读。这一波又一波的反馈风潮，使《三国演义》在泰国受众中地位愈加稳固，并且衍生出新的泰式三国文化。

## 五 反馈与“创新扩散”

最后一点紧承前两点，反馈会激发“创新扩散”。无论意见领袖、把关人还是其他大众，都是传播中的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与传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讨论传播效果的时候，地位甚至还要优于传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sup>[5]</sup>，也就是说信息的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读者（观众）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甚至可以结合自身的条件，如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艺术天赋等对接受的文学文本进行新的建构和阐释。在传播信息面前，受众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有支配文本的权力，并形成“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这种“扩散”指的是

“一种新思维、新知识、新技术等在人群中推广并传播到全社会，最终形成一种共识的过程”<sup>[6]</sup>，它将之前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扩展为“多级传播理论”。越是在异质文化的社会，文学传播想要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越需要人际传播的中介，对源文本进行本土化、创新性的改造，传播层级越多，形式也越多样。

在泰国《三国》传播个案中，雅各布、克立·巴莫、桑·帕塔诺泰等人都是集意见领袖和把关人职能于一身。以他们为代表的泰国作家、学者和思想家们对《三国演义》以及洪版《三国》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写”和阐释，使《三国演义》本土化和洪版《三国》经典化，最终为泰国社会的广大受众完全接受，并内化到泰国的本土文化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泰国已有大约100余种关于《三国》的各类版本。现在这种“重写”风潮仍在继续，各种《三国》的泰文版本仍在不断推陈出新。藉此，传播方式日趋创新多样，衍生出泰国独有的三国政治文化。1992年之前，泰国长期由军人政府当政，泰国人民从未放弃争取民主、反对军事独裁的努力，但是由于军政府当局严酷的文化管制，人们一直苦于找不到表达政治观点、抒发胸中愤懑的渠道。这时，人们想到了《三国》，《三国》里面充满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血雨腥风的军事斗争，故事里叱咤风云的主人公都是军人，政权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因此《三国》成了泰国人用来影射军人独裁政府政权的绝好材料。由法政大学学生组织演出的“法政戏”或称“卫国戏”，是用泰语来表演的中式戏剧，剧目都是泰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通常都是影射和讽刺军政府。法政戏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运动和广场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每当国家爆发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和运动，法政戏都会粉墨登场，在集会广场演出，它已经成为泰国标志性的爱国演出形式。早期参与法政戏演出和剧本编写的人，很多后来都成为泰国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社尼·巴莫亲王、川·立派、皮拉蓬·伊

萨帕迪、塔纳西·沙瓦迪瓦亲王、威他亚·素丹隆等，其中前两位还担任过泰国的总理。1992年以后，泰国终于进入长期文人执政的民主政治时期，但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的“三国政治文化”并未因此而消失，反而内容更加多样，应用更加宽泛。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三国》专栏，部分是为普及文史知识或文学性的评论，但很多都是通过谈论《三国》来评论当下发生的时事政治事件。如果与传统的三国政治文化进行比较，最初是曼谷王朝一世王授意“翻译”《三国》，是官方以《三国》作为训谕和政治宣传的工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官方灌输；而后来则是自下而上，民间从《三国》中吸取政治智慧，借古喻今，以古讽今，后者显然更有活力，长盛不衰。此外，泰国的三国文化还包括民间祭祀仪式、佛寺壁画、商业应用、影视动画等，形式多样，层出不穷，充分体现出反馈带来的“创新扩散”的多样化特征。

## 结语

总之，《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够在泰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良好的“反馈”功不可没，它为《三国演义》在泰国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立体的图景，是传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三国演义》的跨文化传播是中泰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经历了一个文化接触、文化过滤和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的关系是在沟通和交流中动态地确立起来的。每一位受传者通过反馈又成为次一级传播的传者，将原有的传播又向前推进一步，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反馈传播共同构成了《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整体。在今天这个多媒体时代，通过反馈的视角来观察《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这一经典个案，也有助于打破文学传播中的文本中心主义。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综合构建了一个文学在异文化语境中的面貌。

## 【注释】

[1] 甘锋 《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 乐黛云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3] 〈泰〉玛丽尼·蒂洛瓦尼 《〈三国〉中的泰国特征：写作样式》（泰文），《法政大学学报》1984年6月号。

[4] Malinee Dilokvanich, “Samkok: A Study of a Thai

Adaptation of a Chinese Novel”,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3, pp. 282-286.

[5]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62.

[6] 程曼丽、王维佳 《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责任编辑：王九龙】